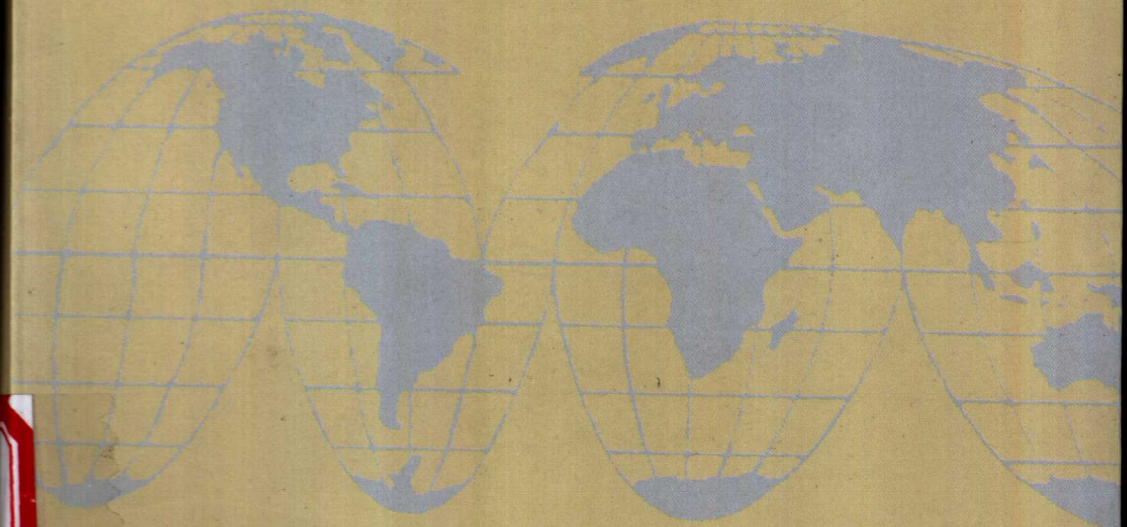




理念与悲曲

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

丁宏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4

理念与悲曲

——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

丁宏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丁宏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4)

ISBN 7-301-05916-7

I. 理… II. 丁… III. 华兹华斯-文艺思想-文学研究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核字(2002)第 081143 号

书 名: 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

著作责任者: 丁宏为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916-7/I·06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zwd@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12.375 印张 35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本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特此致谢。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尤其是解放后经过 1952 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集中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的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和广泛影响的专著中,不少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国际同行直接对话,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弘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联合主办“欧美文学研究丛书”。丛书的选题涵盖三个领域:(1) 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 欧美文学与宗教;(3) 欧美文论研究。为了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论丛的每一辑都集中围绕上述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组稿和编辑工作由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具体负责。作者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邀请欧美文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以及其他校外专家学者加盟。

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和优秀成果,以此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做出贡献。

本辑为论丛的第一辑,集中围绕欧美经典作家作品展开研究,有

不少成果是首次发表,作者阵容则显示了欧美文学研究后继力量的雄厚。

编 者

2002 年 3 月

序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被当今欧美学界大致公认为最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也是所有英国作家中最热门的评论对象之一。重要作家成为评论目标,再自然不过。但就华氏而言,若把他与中国社会稍做联系,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即相应产生两种意义。作为伟大浪漫诗人,他让我们得以聆听一位后革命文学家经过精神磨难和思想辗转而想要说的话;作为评论对象,他让我们得以领略当今英美评论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趣味,甚至窥见其存在的问题。

后种意义算是附加的收获,而前者则更有他山攻错之用。一位诗人,经过山海风雾的开导、文学经典的陶冶和革命狂潮的摧撼,觉得自己终有资格就人类、国家、文化、历史、未来等沉重话题进行思考,如此姿态在西方经常不得其所,但似应引起我们这个一百年来社会动荡不止的民族的关注。所谓“后革命”(英文称“postrevolutionary”)境界,当然不简单指“革命后期”或“革命过后”,而是在革命余波中与某些革命理念近切的纠缠、对它们的梳理、反思或批判,以不同视角与其形成张力,于是成为一种思想类型,亦可以存在于风波消逝之后。依此类推,社会中应该也有革命的和前革命的思维形态,有时势力过强,形成习惯。长期以来,东西方许多读者一提到华兹华斯,多联想到“湖畔诗人”、“自然诗人”或“消极浪漫”等概念。这些说法不无方便,但往往及果不及因,及一不及二,不足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他写了那些诗,为什么诗内有那些含意,以及它们到底与我們有何相关性。具体讲,在实质上,我们对于后革命境界的疏忽可能导致我们同时忽略华诗中一个伟大传统之强化,即贯穿于英美文坛至少 200 年的、由一些重要文学家(尤其一些诗人)所代表的、集思想解放和文化守成两貌似对立因素为一体的文化脉络,它也是浪漫主

义留给人类的遗产,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种。对于它的再认识有助于缓解我们对“英国浪漫主义”概念的单线条理解,抑制我们对于“浪漫”一词所含有的种种涉及个性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无限揣测。笔者无力正面讨论如此重大话题,也无意使用“跨文化”视角纵论国人的认受,只想在此先行为本人较专门的兴趣扯上一点背景意义。

18世纪最后两三年内,华兹华斯开始构思其安身立命之作——哲思长诗《隐士》(*The Recluse*),欲分为三大部分,但后来只写了不足其计划的一半就搁置下来,付梓传世的基本只有称作《序曲》(*The Prelude*)的8千行“导言”和作为第二部分的9卷本《漫游》(*The Excursion*)。何谓“哲思”?“哲思”什么?华氏另附上一个107行的《纲领》(“Prospectus”),对此有所交待。他说,尽管理想的听众可能人数有限,但对于被他选中者,

我将吟诵真理,吟诵宏大气象、
美、爱、希望,以及忧郁的
恐惧如何服从于信仰;吟诵
灾难中惠临的慰藉;吟诵
德行品性和精神的力量;吟诵
在最广大普通人中传布的欢乐;
吟诵个人的心灵如何守住
她自己神圣不侵的幽居,在那里
只臣服于良知;也吟诵那个支配
一切的天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
法理。^①

这是宏大的姿态,吟诵的内容也显得抽象,但其实不乏沉稳与平凡,从后革命角度看,都涉及人世间恒久的“法理”(law)。甚至诗人一上来就为这宏大姿态做像:

在孤独中沉思,思考人类,思考
自然,思考人间生活,我常常

^① “Prospectus to *The Recluse*”, 14-23行。

悟见一队队美妙的意象在面前
 飘升,伴随着感觉到的纯净欣悦,
 或者也掺融着并非不快的悲哀;
^①

我们要聚焦的就是这“沉思”的意象:孤独中的哲思者——这是诗人自我认同的肖像,是他成熟期的定位。此处“沉思”的英文为“musing”,亦作“冥思”、“凝视”和“回味”,都关系到本书后面涉及的“凝思”和“灵视”概念;细细品味的对象则是异样感觉的融合体,含着阴沉与甘美、欣悦与悲哀,悲哀因给人快感而化作欣悦,这也涉及本书有关后革命精神食粮的主要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般读者谈起华氏诗论,往往想到自然的吟唱和自发的抒表,所依据的是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2)中说过的半句话:诗歌创作应该是“强烈情感的自发涌出”(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但这种联想不全面,也不深入,对这个概念理解有误,至少置文中其他说法于不顾,即:能自发表意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刻的思索。“涌出”(overflow)也指“外溢”,暗示胸臆之饱和,体现长期思想之积累,决非短浅躁进的有感而发。因此,华氏后革命所及之意无论轻重,所写之物无论大小,都需我们问个“为什么”。

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文学交接时期的英国文人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文坛伦勃朗之誉,其为文化名人所“绘”文字肖像都栩栩如生,华氏也在其笔下展示为今人不大熟悉的一面。一次餐聚,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着“无足轻重的”话题,上甜点时,“喧哗声”愈烈,待稍有间歇,卡莱尔向左前方望去,但见老年华氏坐在灯影中,“静静地、缓缓地却又坚定不渝地啃咬着我以为应该是葡萄干的残余部分,其目光和注意力只固定在葡萄干身上,绝无他顾。”卡莱尔感叹一个人的专注力竟如此具体,对周围人的社交时谈“无动于衷”,“有如磐石一般”,一时觉得“快慰而有趣”,只怨自己“不

^① “Prospectus to *The Recluse*”, 1—5 行。

能吃葡萄干”。^① 卡莱尔对华氏的描述令人想到华氏对一位老乞丐的描述。在他 1798 年写的《康伯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中,诗人说老丐咬干粮时,神情“严肃”,不理睬四周欲争食碎屑的鸟雀;行走时,双眼永远盯着跟前巴掌大的地面。若说诗人在老丐身上略有移情,并不过分,因为华诗中语者与人物之间的界线常飘忽不定。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看卡莱尔聚焦的镜像:一位孤独的咀嚼者,不拒社交宴请,却不卷入周围的喧哗,慢慢享用个人的食粮,专注地品味甜美。如此带一点卡通风格的画像是否能产生比喻效果? 具体行为居然也可能变成一种转喻(trope)? 或许有此可能,因为,若引申一下,联想到《纲略》开头的“自画像”,此形象或许也可以代表后革命精神食粮的咀嚼者,代表成诗过程的缓慢、深沉、专注和坚决。本书欲谈论人间悲情作为后革命精神食粮与华氏整体哲思的关联,首先所要面对的正是这咀嚼行为,是思绪回味者和诗料反刍者之形象。如此诗人不是热衷于有感而发或一气呵成;在社会层面,也不是着眼于一呼百应和现实革变,而是(用下一代浪漫诗人济慈爱用的语汇讲)先行让“心灵的软腭”对具体的实在因素产生“味觉”,^② 甚至在人世悲意中体味到永恒和甘美,于是使自己和读者得以触及较深的道理。

“反刍”过程以其相对于经历层面的间接性和超拔性为华氏所中意,体现他对社会、政治、教育和艺术等领域中各种各样直接或迫不及待行为的怀疑和反感。在《序曲》第三卷中,华氏一边批评现行大学的浮华和浅薄,一边憧憬理想学苑的样子,希望它能够成为思考者的舒适家园,能使人“肃然起敬”:

一个娴雅端庄的所在,反刍

① 卡莱尔《回忆录》,见 Thomas Carlyle, *Reminiscences*, fro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6th Edition.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3, 922 页。

② 见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十四行诗“I cry your mercy—pity—love! —aye, love”。

动物的乐园,恬静的生命能自由
徘徊;河旁有苍鹭喜欢伴着
缓缓流水进餐,翠柏尖顶的
鹈鹕孤身独憩,在冥思默想中
沐浴太阳的光芒。^①

诗人作为“反刍动物”(ruminating creatures)不是逃避生命能量,而是力求更多、更细地汲取生活滋养。华诗读者一般也应该记起诗人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过的另一句名言,即:“(诗歌)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 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由于“回忆起的情感”不同于即时的反应,诗人看问题的方式和所看到的画面都发生变化;后革命的 musing 使他从抽象理念转向基本原则,从社会话语转向诗意洞思,从历史主义概念的“历史”或“事件”转向他在 1798 年名作《丁登寺》(“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郑重提到的“沉静而永在的人性悲曲”(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② 这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层面具有重要意义。1792 年,法国革命如火如荼,身在法国的华兹华斯常与一位共和派友人漫步于卢瓦(Loire)河畔。一天,他俩路遇一位未成年少女,牵着一头母牛,也未成年,人和牛都是一副困苦交加的样子。这是直接的、客观的社会现实样本,就发生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俩也做出即刻的反应:“‘我们就是 / 为此而战。’”^③ 后革命时期的华氏若碰到类似景象,会作何感想? 六年后,1798 年,他的诗心记起那位康伯兰的老乞丐,对其生活表达了同样的关注,但面对社会福利界人士欲灭除行乞现象的理念,他却感到焦虑,一再强调,应该由着这孤独的老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风雨中生存,在风雨中死去。^④ 如此态度在政治上似乎很不正确。

① 《序曲》第三卷,447-454 行。

② 该诗第 91 行。

③ 《序曲》第九卷,511-534 行。

④ 见《康伯兰的老乞丐》尾段。

诗人变成旁观者,也满足于旁观者身份,当然他也是一位善于凝视的旁观者,经常在历史样本中灵视到超越历史时限的精神存在,于是也间或体味到浑厚的快意。所观的画面不仅仅是“贫穷”,更是“人间”。他会请我们停下脚步,看一看他所看到的画面,以求个人的收获,而如果我们麻木不仁,他会建议我们脚步轻一点绕过它,甚至也会建议政治家、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等各种理论家绕过它,不要动辄插手历史和自然的进程。于是,我们在 1792 和 1798 年之间看到巨大的变化和反差。难道此中隐含着华氏“反动倾向”的证据吗?难道这就是 19 世纪有的英国诗人、以前我国读者和现代英美学人从各种角度撰写社会分析、政治解读和文化批评类文章的温床吗?笔者亦着迷于如此反差,觉得这里面蕴含的问题太多了,或者,从前一境界到后一境界的转变确实为严肃的读者储备着极其丰富的议题,涉及诗论、美学、政治、文化传统等诸多领域。我们还需探索其意义空间,因为许多涉及“转向”和“保守”的观点都成为评论套语,太宽泛,太简单,不足以让我们充分看清华氏后革命之变的性质与意义。

如此反差为笔者支撑起撰写本书的意义框架。另外,展示“不同”视野的《丁登寺》也有此作用,它所涉及的一对不协调的历史画面也间接为本书的议题提供了背后的缘由。国内外评论界对这一不协调现象并不陌生,数年前曾当作热门话题,即:诗人说他五年后故地重游,能听到“人性悲曲”,却居然无视眼前比比皆是的人间不幸场面:乞丐、船工、煤粉、污水、喧闹的机具,等等。这些工业“乱象”当然不在诗中,而是现代历史主义学者的研究发现。诗中虽饱含深刻哲思,属于历史范畴的信息却简单之至,甚至仅与粗线条个人经历有关:1798 年重见丁登寺废墟一带的韦伊(Wye)河畔,心情与五年前大不一样了,而由于此间的社会历练,大自然在个人眼中也显得不一样了,于是在壮美依然的山河间能额外感觉到人间哀情,这是对个人损失的“丰厚补偿”。《丁登寺》被许多学者视作英国文学史上不大不小的里程碑,但其基本时空构架不过如此。然而,正是这“简单”构思让人发现荒诞和讽刺,引出一系列疑问:见河山而不见现实?听悲曲而不闻机器轰鸣?悲曲竟成为补偿?小母牛算不算悲曲?煤炭运输业?与它们直接接触竟不算与悲曲发生关联?到底什么才体现真实

的生活本质？

华兹华斯本人的视野中发生了“现实”(the actual)与“真实”(the truthful)的微妙分歧。根据他在不同诗作和散文中多次表达的意见,我们大致可以将上述所谓“不协调”解释为“现实苦难”与“真实苦难”的张力关系。暂且机械地看,前者涵盖即时信息、实际场面、历史事件、“小母牛”一类的事实,有可能“现”而不“真”;后者似带有形而上的意味,概念较宏大,体现经过提炼的或基本的、永在的、普遍的状况,似乎非“悲曲”之意象而不能代表。在文学层面,注意力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也像从“直抒胸臆”向“平静中回忆”的转变。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转变?是逃避吗?是遮盖吗?转向后者的行为到底有无积极意义?甚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积极意义?为什么后革命诗人对体现基本状况的人间悲情产生饥渴?我们对这种不协调画面中不同因素的关注会导致不同的研究和评论成果。因此,我们需要以更深入而系统的思维和手法来解答此中许许多多的疑问。

还有一对不协调的画面发生在诗外,也让笔者体味到讽刺,亦为本书添加一点文外的意义。东西方有各自的文化议程,历史发展相对不同步,各方评论界沿行的轨迹亦存在时间错位,可称之为“时间差”。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轨道当然并不只是各顾各地并行前伸,而是经常相互作用,发生交叉和互动;大家又频用相同的词汇和概念,你谈论的“主义”也是我嘴上的“主义”,你的文化资源自然而然地为我所用,这里面甚至还有盲目的追赶和刻意的误读,而这些都不足为怪,但结果是各种理论和流派在不同文化土壤中演化出千奇百怪的色调。这也是产生问题的温床。笔者无意专论此现象,也无力梳理英国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只是觉得“时间差”之产生首先反应某特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导致对某位作家或某种主义的误解,有时达到较严重的程度,妨碍我们更全面地继承各自的优良文化遗产。

拜伦在东西方的命运是个明显的例子。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他的名声在欧洲如日中天,但很快“拜伦现象”成为反思对象,其地位也开始落向较客观贴切的水平,而却在“五四”后的中国又不断上升,再次让他成为“文化英雄”,其所大力推崇的旧式文风也基本淹没在自

由斗士的光焰中。华兹华斯的情况则直到今天仍有相关性。由于其革命精神转向的某些外在迹象,我们长期以来,因文化语境所限,一直视其为落后文人的代表,甚至批判其反动倾向。19世纪上半叶,英国文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拜伦、雪莱和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从不同角度对华氏的批评就能预示我们的某些立场。但中叶后,欧美思想界基本接过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有关华氏是英史三大诗人之一(前面的两位: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说法,逐渐认识到华氏诗歌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地位,从各种角度对他的研究也多了起来。而我国的“反思”则晚了许多。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后,我国社会的定位达到相对稳定,文革结束,改革开始,对华氏这样的西方文人的社会学式的、历史主义的批评方式也开始弱化,尽管有时仍按惯性单调地将他与山林水泽做不懈的联系,但慢慢已有人已开始掂量其精神遗产的分量,新编《欧洲文学史》^①的编者也选择了不同的文路。

而大约就在这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在美国和英国,对社会革命风潮未有真正体验的一些校园学者开始质疑欧美此前的评论传统,重新拾起社会学批评手法,又回过头来诊断华氏精神世界的问题或病症。环视普遍的评论局面,历史主义成为“新历史主义”,帮我们找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评论支点,历史语境和文化运作的画面也更加丰富、生动、复杂,因此,评论效果的正面意义不容忽视。不过,具体就新历史主义在浪漫文学领域的运用而言(不去管它在其他领域的运用),它与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批评等流派混杂在一起,未能摆脱传统的政治评判所爱用的论说框架,于是华氏再次成为标靶,各种貌似新颖的俗套,诸如“逃避”、“涂抹”、“落后”、“不正确”等,又纷纷跃然纸上。再下一步:或许我国学者又要借鉴国外的新成果?是否有些认识尚未“校正”过来就又受到欧美政治性批评手法的牵制?若把东西方评论界合成一个大舞台,我们所见真可谓学术杂技、乾坤挪移,但这个不协调的背景画面正是使本书产生一定意义的一个小方面,因为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华氏主要说了什么,探讨其文学

^①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1。

思想和实践与今人关联之所在。

正面探讨不方便,全面论述更不可能,因此笔者取道具体话题,以斑见豹。具体话题也是关键话题,即涉及以上提到的华氏转向人间悲情并写出许多悲情诗的问题。为什么他的诗作中有一种压倒性的质感?为什么多涉及人间悲苦?探索此中的所以然有助于我们领悟那位反刍者的后革命境界,了解重要文化传统的确立,也会发现华诗中仍蕴藏着“宝物”。本书审视的主要议题包括:诗人为何执意认为人只有变得悲哀些,才能更聪慧些;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视角移变;作为“时差”的回忆;乐曲作为本质的、阴沉的、跨越历史的真理;《序曲》中逆向思维的重复;路过与顿悟;对悲苦的人为选择;真实事物如何促成更强劲的精神飞升;文学思维与梦者的责任,等。所涉及的作品基本为华氏十年创作“高峰期”(约为1797—1807)的产物。

探索过程不仅应该依赖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继承各种历史主义研究成果,也必须采纳一系列跨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或超越历史的(supra-historical)论说语汇。谈论诗歌,最终不可能不深入文学本身的领地,还有哲学和美学;不可能仅在外围揣测文学的历史形状。因此,作为本书附带的目的,笔者指望凭借多角度文本解析,质疑单一历史视角的偏颇。华氏可以批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念“演练”,我们也可以审视我们作为批评家的理论试新。比如,本书第二章质疑英美某些理论家仅从历史发展视角做出的抽象断言,即:《抒情歌谣集》十年前也照样写得出来。这一假设出自对历史语境的判断,以为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某些特定的作品就可以产生。但是,此断言因无法验证而丧失一部分意义。其次,它仅在文化意义的生成方面具有一定道理,因为不同时代确能赋予作品不同意义,然而就作品本身的诞生而言,此观点则与历史主义者强调的动态语境决定论相悖。因为,既然某作品与具体而复杂的语境有因果关联,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凭想像将它植入其他貌似具有相同语境的历史阶段。本书认同这种因果逻辑,因此也怀疑有关华氏在法国革命前也能写出那些抒情悲曲这一结论的有效性,认为大革命和葛德汶(William Godwin, 1756—1836)主义是《抒情歌谣集》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只有这些外在因素才促使华氏写出《丁登寺》和《迈克尔》(“Michael”)

等一类的诗作。但是,本书对如此关联也不乏疑问,也试图探讨为什么写作动机可以受到制约,但作品内容和思想含义很难追溯到历史主义概念中的具体源头或语境。我们当然可以说,就连华氏对历史事件决定论的刻意的理论否定也是被历史事件决定的,但这样说仍然只是在作品外围或就理论问题绕圈子,并未真正涉及有机而活跃的内部因素。具体语境材料不管多复杂,多全面,在试图界定诗人的想像活动时,总会暴露力不从心的一面,因此才进而需要尽可能深入的内在分析。

以上提到,在相当程度上,后革命时期华氏转向“悲曲”的过程即是改变看问题方式的过程,即是告别较单一的社会政治的、历史式的、纯理念的话语方式而转向文学思维,转向体现诗意灵视的表意“话语”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理念”和“悲曲”之间看到两种类型的认知方式,前者有自己的意义体系,有一整套相关的语汇,而后者也有自己的意义空间。两者当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对方,甚至经常相互容纳,但后者的意义生成方式又不等同于前者,意义本身于是也具有了特性。因此,当我们阅读和分析华兹华斯写的那些涉及人间悲情的诗歌时,我们似乎也应产生论证、甚至认可后一种思维方式的心情,毕竟里面的内涵太多了。华氏提到过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心灵的成长”;一个人经过磨难和锤炼,可以变得更充实、更智慧。那么,用平俗的语言讲,我们能否让自己想像一下,从理念到悲曲、从“外围”到“内在”,从小母牛到乞丐、从直接反应到咀嚼葡萄干、从历史主义到文学思维是不是恰恰体现这种成长呢?因悲哀画面而获得快感,这是否印证了心灵的成长呢?这是怎样一种成长?文学思维怎么竟体现成熟?为什么眼界放开后倒能够洞见恒久的原则,因而产生对传统的敬意?说得近一点,至少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认为作家的某些文学创作活动能代表真正的心灵力量,比如不拒题材和个人不卷入的逆说(paradoxical)态度就是一种力量,而济慈、勃朗宁、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和爱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等都视此为作家的美德和特权,更不用提莎士比亚了。当然,有关悲曲体现成长的其他解释就太多了。

综上所述,本书力求通过对华氏具体文思和悲情诗作的重新解

读,对华兹华斯相对于我国读者较陌生的一面做一个专题研究,在较深层的平面上揭示由华氏这位主要诗人所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的一种重要概念。本书有些段落体现笔者比较文学的心情与视角,但具体文字中基本无中西比较性质的技术内容,这是为尽量保证原诗解读的贴切,不影响专题研究的连贯性和可靠性,也为了以较系统的方式与英美较系统的华氏评论进行一点对话。当然,这里面也因此会有一点缺憾。

本书汇集笔者多年的零散心得,技术上则沿用数年前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的框架和部分内容,只是为符合中文书的形式,经过增删、修改和发挥,原文一些地方已面目全非,某些观点也体现较近的认识。但笔者仍要首先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原讲座教授姜安道(Prof. Andrew Parkin)在本人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启发和帮助。没有当时,也没有现在。本书局部内容,尤其第五、六两章中的一些文字,曾作为文章的一部分于2001年分别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国外文学》这两个刊物上,另有第三章的一些段落将以略微不同的形式见诸后者。谨对两刊物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对盛宁和刘锋两位先生代表各自刊物对本人的鼓励表示感谢。刘锋先生作为邻居,其私人藏书为本人屡解燃眉之急。本书第四章曾以简化的形式作为主题发言稿在中国第三届英国文学年会上宣读,并有幸选入北大刘意青教授主编的英美文学论文集中(尚不知正式名称)。此外,本书频繁引用或参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1999年出版的本人译著《序曲》,这也让我想起当时该出版公司——尤其本人挚友贾辉丰先生——所给予的不懈支持,在此再表谢意。北大图书馆陈体仁先生对本人的帮助亦体现了多年的友情。

本书获得“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使写作过程方便许多,这也要感谢申丹教授在北大外语学院内的召集和组织。北大韩敏中教授和北京经贸大学吴芬教授曾以文字的形式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热情推动,体现两位老师多年来对本人所作所为的认可。北大出版社张文定副总编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曾给予笔者有益的指点。其他许多老师、友人、英语系领导(尤其程朝翔主任)、同事、学生都曾以不同的形式给予本人启发和帮助,20年前本人母校美国